

# 王凯 青春岁月植此青绿

文 王小柔

很难想象一个年轻人顶着风沙,一待十几年,像树一样在内蒙古科尔沁的沙地里扎下了根。说起在那里种下的400多万棵树,王凯的语气里充满幸福感。因为每一棵树的茁壮成长,积攒着很多个春秋的隐忍,很多个朝暮的不动声色。哪怕孤独,也要站成一片绿色。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,苍凉,在他心里有了另一番浪漫。只把他乡作故乡,他的小单元房就是他的诗和远方,除了种树、日常巡视,空闲时他看文献、做植物标

本,或打游戏,摆弄变形机甲模型。最让我意外的是,他会织毛衣,甚至还聊起了如何起平针、如何合片儿。王凯乐观的性格就像森林,所有的黄沙已被屏蔽在心灵外。当无人机升起,从监控里看到栉比鳞次的大杨树蔓延在土地上,我理解了他的幸福。身不移,境转,是树的追逐之道。树不惧时间,不迫求速度。它们顺应着时间的节奏蓄积、生长,顶天立地是它们最强大的姿态,根深叶茂是它们最富有的样子。

十年前,春天植树时,经常遇到沙尘暴、大雨、大雪。空气里的沙落到身上,根本清理不掉。植物的刺,随时会扎到手上脚上……哪怕被晒得脱掉好几层皮,别人眼中的苦,在王凯那儿只是笑笑。从他只身进入沙化地区开始,岁月就变成了一部底色粗犷的电影:赶很远很远的路,和当地农户混在一块儿,种树、养树、观测、沟通……目送大漠落日,匆匆又是一天。他说:“向下扎根的是树苗,向上生长的是希望。”



王凯

38岁,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,自2006年在聋哑学校志愿服务开始,步入公益领域。从2012年至2023年,在内蒙古、宁夏两地栽植400多万棵乔灌木,恢复4万余亩沙化土地。

## 王凯访谈 经历困顿迷惘 坚持理想主义

王小柔:工作中,你的背包里都会装着什么?

王凯:我的背包总是特别沉,里面有:植物图鉴、样方框、喷漆、追踪带、铝制标签、计数器、对讲机、红外线测高仪、机械测高仪、塔尺、电子游标卡尺、1米游标卡尺、胸径尺、折叠尺、卷尺、50卷尺、照相机、无人机、工具包、手持GPS定位系统、技术指导教材。这些都是我背包中的标配。因为,树木覆盖度是界定沙地状态的重要指标,我除了种树,还要负责生物多样性调查、物种多样性调查,以及调研它们的丰富度、均匀度。多样化的植被结构,可以提供动物多样化的栖所、增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。

王小柔:是不是用无人机配合检测和调查,可以节省一些人力?

王凯:我自己买了一台无人机,2018年,在宁夏保护区的沙地里飞丢了,今年我去宁夏做生态调研居然给找到了!最近我一直在看无人机方面的文献,如果将来无人机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廉价并且精度更高的水平,我会考虑用它替代现在的一些工作方法,因为从客观条件来讲确实做不过来了。但这个愿望可能还得过个两三年吧,研发进度还没那么快。

王小柔: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?

王凯:当年初入此行时,很多同行者和前辈都告诉我,要记得为何做公益。多年后,岁数大了,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,坦诚地面对自我,才是更重要的。一个人在经历了困顿、迷茫、诱惑之后,在不断拷问我是谁之后,驱动他走在路上的,应该是理性和本我,而不是枷锁。理想主义者都在脚踏实地,但反之不然。希望多一些诚实的灵魂,而我自己对灵魂更诚实。

王小柔:你会有觉得崩溃的时候吗?

王凯:每年,我有三个月时间待在上海写报告,做案头工作。10月,主要测量每棵树的树高、长势,然后进行数据分析,交给捐助方。每年统计,处理几万字数据有点吃力,我很崩溃,因为数学不是很好,一年报告要写3万多字,抵得上一篇硕士毕业论文的体量。

王小柔:你孤守大漠这么多年,成家了吗?

王凯:我不排斥孤独,甚至很享受孤独的状态。总有人说给我介绍对象,但也没有谁真的行动过。对于成家这件事,我现在基本就是躺平状态,连我妈都不怎么催我了。我大概内心还是有些偏执,想找到跟我一样热爱公益事业的女孩,至少她能理解我。另外,我这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大部分时间不是看牛就是看树,别谈女孩,连人都很少能遇见,接触异性的概率太低。爱情这东西就是“玄学”,能遇到当然最好,遇不到那就遇不到吧。

(图片由王凯提供)

## 在内蒙古科尔沁种树 丢失了时间和距离感

王凯大学专业学的是农业资源与环境,在学校,他成立了帮助聋哑人的社团,做公益。2009年毕业,他去张家口市张北县,做了两年多扶贫志愿工作。上海根与芽青少年活动中心的“百万植树计划”启动于2007年。2012年,项目已经做大了,王凯应聘到内蒙古科尔沁治理风沙。

从上海飞往沈阳,再驱车赶往内蒙古库伦旗,行程约7小时。越接近科尔沁,窗外的景色越单调,从绿色的田头、苍劲的杨树林,到被风沙侵袭的植被、冷清的道路,以及不断随风席卷而来的沙尘。到达科尔沁沙地,脚下的沙土很细腻,每一脚深浅不同,鞋子里会进很多沙。风势很强劲,卷起满地的沙尘袭来,不一会儿,眼睛、鼻子、嘴巴,甚至耳朵,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沙土。“种树”是一个很浪漫的字,但这个词的背后,是最猛烈的风,最烫人的沙,以及最无私的心。沙带着风,打疼脖子和脸,烈日很毒,王凯裸露的皮肤很快变成焦糖色,但他不在乎,也不戴防护用具。

不停地赶路,成了王凯最要紧的事。需要做风沙治理的地方环境很差,位置偏远。开车单程,近则30公里,远达120公里,最多的时候一天来回跑400公里。到达目的地后,王凯带着三位招募的村民,拿一些表格和地图去观察和记录植被情况、野生动物变化情况。当地是游牧地区,他们还得分看植区有没有牛羊放牧,观察封育的完整度,会不会出现风蚀。

很多朋友以为王凯的困境是孤独。其实在科尔沁,独自工作的最大麻烦不是孤独,而是一旦他生病或有事,没有别人可及时接替。当时200万棵树要种在30多个地块上,彼此相距甚远。可以说,除了王凯,其他人找不到路。

在北方,树长得很慢,可能几年都看不到变化。王凯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:“你做的事很有意义。”但自我感动扛不了太久,很快又想起:“这些树能不能长成林子?”心里依然没底。只有很多年过去,当他走到来这里第一天种下树苗的地方,发现满眼绿意那么壮观,会突然觉得,这件事真的很有意义。

王凯的时间表很有规律:春季最忙,组织栽植和协同项目组同事完成企业志愿植树活动,几乎没有周末;5月、6月进行评估;7月算是年假,可休息一段时间,回家或旅行;7月底到9月初,是和项目组同事一起组织内蒙古和宁夏项目地的生态多样性调查,以及宁夏项目地的企业志愿植树活动;秋天又开始忙起来,年底还有一次评估。总体来说,春秋忙,夏天闲。

在科尔沁沙地,王凯丢掉了两样东西。一样是时间概念。他可能早上6点爬起来工作,也可能9点半才起来,渐渐没有了上班的时间表,生活不再有周期循环。最忙的4月和10月,他完全看天,下雨休息,不下雨工作。所以中间若回上海公司写报告,他至少要花一两天来适应都市的节奏。第二样失去的,是空间距离感。他日常要给每块地采样,每年要测量8000棵树,每次出门来回至少120公里,理解距离的比例尺都变了。所以谁说100公里以下,他觉得很近,对别人口中的“远”已经没有了感觉。

## 治沙行动充满坎坷 改变当地农户观念

说起来,治理风沙技术非常简单,树苗用围栏围起来封育,造防护林网和灌木林带网,只要没人干扰,植被自然就会恢复。王凯没想到,比种树难的是人际沟通,把树种下去的背后,存在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。最初,当地百姓并不愿意,或者抱着“拆迁征地”的思维,认为有人使用土地,应当予以他们经济补偿。风沙治理与当地人的经济利益有潜在的矛盾。

科尔沁沙化的重要原因是过度放牧和开垦,植树造林或者封育等手段,都会直接导致短期内不能放牧,从而造成个人的经济损失,但将时间尺度拉长,这是件双赢的事情。所以,刚到科尔沁的王凯到农户家走访,为了表达诚意,需要跟农户喝酒,常常一顿酒喝多半天,生生把酒量练出来了。王凯一般先尽量寻找特别偏远,现阶段他们不会放牧、完全没用的废弃之地,反复跟当地农户沟通,解释同一个事实:“地还是你们的。”

地方政府、主管单位、土地所有人、利益相关者,有威望的村干部……王凯本人其实不太擅长沟通,但他生于北方,此前又和河北农民

打过交道,能较快了解内蒙古这一带村民的逻辑和观念。

干公益这一行,免不了遭遇挫败感,时常得承受不尽如人意的情况。比如,经过一两年的努力,某块地的林地从10%恢复到35%左右,从流沙变为固定沙丘,好不容易初显成效。可此时有些农户一看,植被变好了,可食牧草多起来了!他们会穿过围栏破口,跑进去放牛羊。

于是,植被慢慢下降,退回到流沙状态,这很常见。虽不至于达到毁灭性,但一定会阻碍理想的进程。也许原本三年即可恢复,现在要花费五年时间。辛辛苦苦好几年,忽然发现某一块地方的状况还不如以前,心里不舒服。

王凯与当地农户签订过约束条款,但实际上只能规范不出现重大破坏行为。放几十只羊进去,问题说大不大。毕竟地权是他们的,王凯能做的只是稍微约束一下,不可过度干扰。公益组织扮演的角色是环保教育,不能强制,更没必要直接谴责。通常发现破坏现象,王凯会和农户、护林员聊天,慢慢商量。他们一般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,清楚这片地原来的模样,也见证了从“草很好”沦落为“沙很大”的过程,道理都明白。他们只不过感觉草变好了,以为偶尔放牧一下,没什么大碍。沟通过程中王凯也会反思,是否我们的围栏挡住了当地人更便捷的路?久而久之,经常打交道的村委会、农户都认识他了。

为了监控沙化的程度,王凯花费了很大力气,买了大量标杆,做成带刻度的标杆,然后用木榔头往地下打了70厘米,放一排,打算看看一个月后沙子变化多少,做个编号。为了这项实验,他特意找了美国的教授帮助做些探访,还去中科院找专家讨教。万万没想到,一个月过去,所有的标杆竟然不翼而飞。实验计划就此夭折。那会儿很少有人注意到沙漠沙丘的主风向移动现象。这项实验很有意义,根据观察风向,可以判断外围效果。后来有一天,王凯见到一个放牛娃手里拿着一根标杆,他凑上去问哪儿来的,对方很热情地说:“我在地里拔的,没人要,家里还有,你要吗?”

王凯干脆改变计划,在树上或水泥杆上(不会被轻易移动、破坏的地方)做一个粗糙的标记,第二年再观察,简单对比、判断一下,大致了解沙漠的动态变化。他朋友圈里有一张照片,展示了“年速7厘米”——这个掩埋速度很快了。其

实从大的数据看,中国是全球唯一沙漠化面积在减少的国家,内蒙古的沙漠治理非常有成效。但由于早先遗留的基数大,如今问题仍然存在,治理道路依旧漫长。

## 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 每一棵树苗都是希望

一天凌晨,护林员突然来电话,让王凯去看。到了林地,他傻眼了,500多亩樟子松全被齐头割断,无法再生了。后来,护林员的小三轮车也被烧了。这些糟心事,现在可以当八卦说了,因为当王凯看到林子长起来,从小拇指那么粗的树苗长成了二十多米高的大树,黄沙被绿意覆盖,那种成就感让他觉得,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在宁夏,老乡流行一句话:“不植树只能吃一年手把肉,治沙的话,年年都能吃手把肉。”王凯回忆,乘绿皮火车刚到这里时,路都不通,全是沙路或石子路。就算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,地上也总有一层浮灰。春天下雪,雪居然是黄色的,像天上飘着灰烬,天是黄的,地是黄的,太阳暗淡泛着蓝光,街上没人也没有车。王凯独自在这小县城本该最繁华的街道上走着,买了点儿菜回家,发现自己的口罩是黄的,眉毛是黄的,帽子是黄的,家里还停了水。他说,那里赶上雨雪天气都会停水,那一天真有一种末世之感。

王凯把青春裹进黄沙,绽放出绿意。这些绿色在黄沙里起伏,迎着风抵抗漫野的荒芜。近几年,不少志愿者来到库伦旗、科尔沁左翼后旗,体验植树养护过程。“百万植树计划”每年招募林地志愿者,王凯每年能接待两三百人,有企业团队,也有个人,唯有亲临现场,才能理解沙漠化的状况。他说:“你通过微博照片看到风沙很大,环境很糟,都不如实际来一次,被风沙吹一吹的感受来得彻底。”志愿者们每个人一天平均种9棵树,劳动强度不一。沙化厉害处易挖,草根多的地方较难挖。目前王凯管理的项目植树量已达400多万棵。一棵树,扎根于滚滚黄沙,大家也种下了一份惦记,期待着树根越扎越深,苗越长越壮。在浩瀚无垠的沙漠,每一棵种下的树苗都是希望的种子,它们将会顽强地扎根于沙土之中,用绿色的叶片诠释生命的坚韧。树的成长,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,在这片沙漠中,每一份付出都将化为绿洲的起点,让美好憧憬成为可能。

## 讲述

## 中国园艺大师叶家良亲传弟子 水上公园里的新养菊人

口述 陈欣 采写 张洁



陈欣(右)与师父叶家良

近日,在水上公园举办的天津市第58届精品菊花展中,展出了两万盆菊花,其中3000余盆精品菊,以“洁水金霞”“清波泛翠”“霓纱漫舞”等充满诗意的名字,呈现在游客面前。

水上公园里的每一朵菊花,从萌芽到绽放,都凝结着养菊人陈欣与他的师父、中国园艺大师叶家良的心血和智慧。如今,陈欣已接过叶家良手中的接力棒,担任叶家良工作室负责人,水上公园管理处景观管理中心菊花组组长,获得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,也是南开大学非遗项目“津派文人养菊传统栽培技艺”第四代传承人。他向记者讲述了养菊花的故事。

## 菊花守信如君子 花开时节必绽放

2000年,我从天津市园林学校毕业,分配到水上公园。起初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菊花养护,而是加入了绿化队。四年后,我调到菊花栽培小组,记得是3月,菊花未开,处在萌芽阶段,叶家良老师带着我们搬运幼苗、布置花盆。通过几年的学习,我熟悉了不同种类菊花的特点及其应用场

景,也经历了菊花从种子发芽到花朵盛开的过程。

全国性的菊展每三年举办一次。2007年,第九届中国菊花展览会在无锡市锡惠园林文物名胜区举办,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菊展,令我大开眼界——菊花的种类超出想象,制作成各种景观造型,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到场观众也特别多,人山人海,我也体会到了菊花对游客强大的吸引力。

那几年,通过接触不同品种的菊花,我感受到了它们各自的色彩斑斓,尤其当一朵朵娇艳欲滴的花瓣缓缓绽放,那种视觉冲击,简直美不胜收。我深深爱上了养菊这一行。

2014年,我正式拜师园艺大师叶家良为师。我师父10岁开始接触菊花,

对菊花品种有着丰富的见识,全国找不出第二个跟他水平相当的人。他几乎每天都来看室外养护的菊花,观察菊花的情况,包括叶片颜色、生长状态以及是否有病虫害等。如果天气晴朗,叶片颜色正常,喷水也干湿度得当,他就能立即定下当天浇水的时间点。浇水时必须浇均匀,否则再次浇水就会出问题,叶子发黄,甚至植株死亡。绑扎菊花也有技巧,我一开始一长绑30盆,通过不断练习提高速度,后来一个下午能绑100多盆。

师父对我倾囊相授,我对师父充满感激之情。2017年,师父生病住院,正赶上盆盆,特别忙,我每天在工作现场忙一整天,下班后就去医院陪伴师父,汇报菊花的生长状况。那年天气炎热,雨水集中,菊花质量受到影响,师父看过我拍的照片,对菊花的长势表示肯定,他对我说:“如果不是你悉心照顾,这些花可能就毁了。”

我从师父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养花,还有做人。梅兰竹菊,被誉为“花中四君子”,师父时常告诉我,人应如菊花一般信守承诺——无论外界环境如何,待到花开时节,它必会绽放,这正是君子守信的体现。养花亦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品格,对待每一盆菊花,无论浇水还是施肥,都应一视同

仁,因为某些花的品种稀缺,就对它特殊关照,这是不可取的。

## 养菊二十年 年年育新品

我养菊花二十年,从未间断过。养菊花要露天作业,每年近5000盆种植任务,从扦插、分盆、打顶、套盆、定枝、定蕾到施肥、浇水、绑扎,天天围着菊花转,菊花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。

菊花的理想生长温度不能超过25℃,一旦超过这个温度,花的生长速度就会减慢,直至停滞。比如今年夏天,连续十几天高温天气,菊花生长受阻。菊花不耐涝,尤其在分盆期,如果浇水多了,根系较弱的菊花容易因土壤过湿而腐烂,所以还得控制水分,避免积水,只能等待天气转凉,才能看到它们恢复生长。

天气的变化总是难以应对,我有时会因此而焦虑,但师父告诉我,只要耐心等待时机,就一定能看到令人惊喜的开花。

更难的是,不同品种的菊花对生长环境的要求不一样。有些品种根系较弱,未完全扎根前,遇到高温和肥料过量的情况,可能导致根部烧伤。另外,过量施肥也会使花瓣出现斑斑。彩球形状的菊花如果肥力不足,靠下部的花瓣可能无法完全展开。因此,熟悉每个品种的特性并掌握正确的栽培方法特别重要。

夏至前后,套盆工作繁忙,一天到晚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。地上摆着5000盆菊花,套盆时,要在短时间内尽快把所有的小盆都换成大盆,这样菊花才会生长一致,同期养育。今年,由于天气炎热,花期已经延后了,

如果在套盆时再耽误时间,那么花期会更晚,可能就来不及参加菊花展了,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。

每年我们都要培育新品种,精心挑选“父母本”。然而,一粒种子能否孕育出一个新品种,这就像开盲盒,充满未知与期待。有时初见一朵花,感觉色彩深邃,值得保留作为育种材料;但几天过后,色泽、形态可能就发生了变化,没能达到预期,只好淘汰。假设一年种植500盆幼苗,最后能选出的优秀品种,真的是寥寥无几。

我师父对选种标准极为严苛:株型姿态匀称、花朵大或有独特美感,才能优先考虑保留;反之,株型不佳、易染病或生长不均,则直接淘汰。只有当一个品种在株型、花色及整体协调性上均表现出色时,才是好的品种。

所有的新品种都要经过认证。例如,实生苗要经历三年的栽培观察期,评估它的稳定性,提交报告,邀请专家来鉴定。其他城市的同行大师,都拥有一票否决权,即便是前一年表现优异的品种,若次年稍有退步,如花朵尺寸缩减了,也会被淘汰。通过评审之后,便能获得正式的鉴定证书,参与全国性的比赛。

过去三年里,我们培育出了上百个新品种,其中通过鉴定的超过50种,但其背后是数百乃至上千株幼苗的基数,产出新品种实属不易。

## 赠爱好者菊花 共享花开时刻

前不久,第十五届北京菊花擂台赛决赛在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举办。我们参赛时,从选育、包装到布展,各个环节都力求精益求精,“一品红”夺得品种

菊金奖,新培育的“洁水金霞”获新品种银奖,整体展现了津门园艺的深厚底蕴。

水上公园自2022年举办第一届市民菊花佳品展(即市民菊展)以来,赢得了菊友的认可,大众的口碑。如今,市民菊展已成为继天津市菊花精品展之后,又一响当当的菊花文化品牌。今年的市民菊花佳品展,我们安排了老年大学花卉班学员的作品展示。这些学员大多有三四十年的养花经历,对菊花有着深厚的情感。不少参观者对他们养花的专业水准赞赏不已。

我们选出300个品种,共1000株菊苗,免费提供给喜欢菊花的朋友。我们倾向于选择早花期、适应性强、容易打理的类型,不仅适宜作为标本菊进行栽培,也适合多头菊的种植方式,适应粗放式的养护,能轻松上手。试想,如果连我师父都觉得难以成功培育的某种菊花,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想养好就太难了。我们还需确保每一株菊苗长出根茎,能健康生长后,再赠送给大家。我觉得,这种普及工作非常有意义。

2022年,水上公园“津派文人养菊传统栽培技艺”被列入南开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师父叶家良和我是这项技艺的传承人。津派文人养菊技艺可以达到60天稳定观赏期,是区别于其他栽培方法的一大特色。

我们师徒通过网络平台建立了一个交流群,解答菊花爱好者在栽培与养护菊花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,无论是季节变换时如何养护,还是操作步骤上的疑惑,都尽力提供详尽的操作指南。交流群里的菊花爱好者也体会到了培育菊花的艰辛。当大家经历过漫长的等待,终于迎来花开的那一刻时,内心的那份喜悦难以用语言表达,养菊花的乐趣也在于此。